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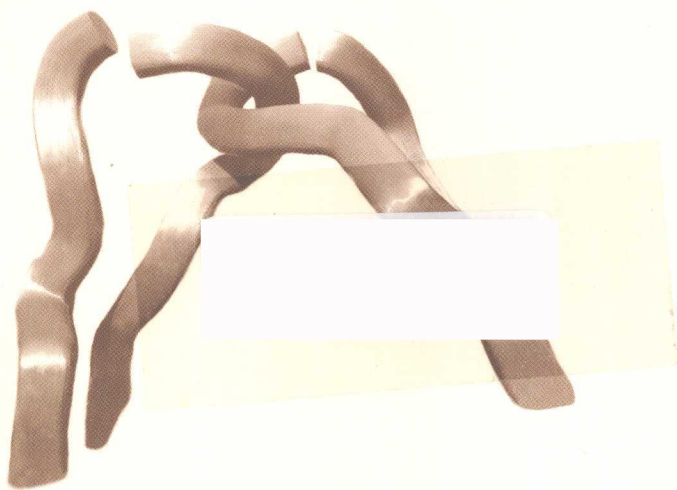
問學

思勉青年学术集刊

第 1 辑

华东师范大学
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

学问的道路，起于问学。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問學

思勉青年学术集刊

第 1 辑

华东师范大学
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问学：思勉青年学术集刊. 第1辑 /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
高等研究院编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
2015.7

ISBN 978-7-108-05359-6

I. ①问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人文科学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8382 号

责任编辑 孙晓林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徐方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 印张 21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3,000 册

定 价 52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发刊词

学问的道路，起于问学。

2015年，学术刊物出现了一个新面孔，《问学——思勉青年学术集刊》在此与学界朋友见面。在当今学术刊物已汗牛充栋的环境中，再推新刊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：我们这一小群抱持理想的学术青年，想为海内外的学术青年开辟一小片阳光与养分皆备的园地，当你们和我们共同的学问萌芽期，可在这片土壤上作思想的徜徉，以求学问的滋长。

本刊是由青年人来编、青年人来写，以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人文领域为主的专业学术集刊，秉持“专业、创新、客观”的方向。“专业”是指文章须得持之有故、论之有据，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功力。“创新”要求文章能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展现新意，而不是刻意标新立异。“客观”则在强调评价标准的公正，不考虑作者的名气、职称或其学术资历与背景，且对于任何学派、任何取向的学术观点，不偏袒、不排斥。只要是符合以上条件的好文章，我们都乐于刊登。本刊完全以专业、严谨的审稿意见，作为稿件采用与否之标准，只有排除非专业的因素，才能凸显学术作品之尊严与价值。

我们广邀志同道合的学术青年共襄此举，在这一专属的平台上，释放出明亮的学术光芒；我们期盼本刊能充当学术青年之间沟通的桥梁，交相问学，彼此激励。我们致力的目标是，呼唤学术青年的热情，激发学术青年的潜力，厚植学术青年的实力。

学问的道路，或可起于《问学》……

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
青年研究员团体

目 录

发刊词 1

晚清民初“小说界革命”与吕思勉文学活动考论 / 王刚 1

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？ / 张耀宗 23

——以叶嘉莹说词为例

文体建构与文化启蒙 / 罗雅琳 38

——《随笔》（1979—2012）研究

卫所裁撤与新县形成 / 王涛 69

——清代广东陆丰设治的卫所因素考察

甲午战争期间盛宣怀与张之洞的交结 / 吉辰 84

戊戌政变前后的天津政情 / 冬烘刚 104

《易传》“圣人观”研究 / 侯展捷 147

从“名”的视角论先秦诸子的发生 / 苟东锋 169

——诸子起源研究的一个新路向

感通能力与“可以为善”：朱子对人性的理解 / 江求流 181

美学视野中的儒家政制 / 金浪 209

——朱光潜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的美学与政治

丸山真男的“国体”批判 / 谢辰 225

生命哲学、少数政治与差异本体论 / 张历君 261

——论德勒兹的《柏格森主义》

ZHI 知 AS UNCEASING DYNAMISM AND PRACTICAL EFFORT:

The Common Roo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Wang Yangming and Peter Sloterdijk

/ Gabriella Stanchina 280

岸本美绪教授访谈录 / 戴海斌采访整理 308

晚清民初“小说界革命”与 吕思勉文学活动考论

王 刚*

内容提要：“小说界革命”对于早年吕思勉影响颇深，本文对吕氏早年文学活动的个案考察，意在管窥近代学者在世风之下的文史互动及转换，从而加深对晚清民国以来的学风及学术之理解。本文认为：1. 吕思勉是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最早响应者和实践者，喜好新小说，并进行创研是其早年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. 经考订，上海古籍出版社“吕思勉文集”中所收四部小说方面的著述中，有一部为伪作，并漏收一部署名为侠人的红学评论之作。3. 吕思勉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，这不仅归因于晚清时代的小说创作，更在于他对民初以来日渐成熟的小说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，在跨越梁启超的同时，也使得完整的“小说学”得以成立。

关键词：吕思勉 “小说界革命” 晚清民初 文学活动

引言：“小说界革命”影响下的吕思勉小说创作与研究

1902年，梁启超在《新小说》创刊号上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，正式拉开了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序幕，自此，“新小说”的创作及小说研究成为一时之风气。作为晚清民初的重要文学思潮，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意义早已超乎文学

* 作者王刚（1971—），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史、古代思想与文化。

之外,并影响着“五四”以后文学的走向。它狂飙突进般地震撼了士林,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强音,近代知识分子鲜有不受其影响者。作为史学大师的吕思勉早年亦被此风,在新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。然而在学界,近代小说研究虽然成果颇丰,对于吕氏的探讨却相对不足。¹近年来,随着对吕思勉研究的深入,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“吕思勉文集”及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的逐次推出,研究材料日渐丰富,为更细致的考察准备了条件。

对于史家吕思勉的文学活动进行研究,其意义何在呢?长期以来,在学术研究中由于学科界域之影响,除了一些明显横跨文史的大家,如王国维、梁启超等,文史两界皆有讨论。在一般的研究工作中,一些明显“定性”的学者身份化后,仅被关注于一端。具体说来,就本论题所及,史学研究者不关注史家的文学历程;反之,文学研究中缺乏对史家的文学活动考察,文学史成为了对文学家或文学工作者的研究。然而,仅就近代学术史来看,无论偏史还是偏文,文史大家往往难分轩輊,后世的学术研究在精密化的同时,也造成了文史之间的横隔。吕思勉就是一典型个案,由于吕氏在后世已被视为“纯粹的一代史家”,²加之本人对于早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研究绝口不提,所以,作为“文学人”的吕思勉长期被漠视,至少此方形象不丰满立体,在研究上留有很大空地。有鉴于此,对吕思勉在晚清民初的小说创研进行考察,不仅可以丰富吕思勉研

-
- 1 对吕思勉的小说及文学研究,基本集中于对吕氏《小说丛话》的研讨,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,在黄霖、韩同文选注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(下)(江西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403页)中,曾论及吕思勉的《小说丛话》,从人物与结构、虚与实、情与知、美与善四方面加以归纳。此后,黄霖在所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(近代卷)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)中有专门论述,后收录在王运熙、顾易生主编《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》(下册)(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1年)。然而,万学的《近代小说理论研究的丰碑:评吕思勉的〈小说丛话〉》(《临沂师专学报》1992年第1期)与黄氏所论几乎一字不差,其中必有剿说者。此外,论及《小说丛话》的成果主要有关诗珮:《吕思勉〈小说丛话〉对太田善男〈文学概论〉的吸入》(《复旦学报》[社科版]2008年第2期)及韩进廉:《中国小说美学史》(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4年);罗书华:《中国小说学主流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7年);张为刚:《〈中华小说界〉研究》(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)中的相关部分。近年来,邹国义师的《青年吕思勉与〈中国女侦探〉的创作》(上海大学历史系、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主办“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2009年10月,后载于陈勇、谢维扬主编:《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年),则是对吕氏小说创作进行个案分析,具有开创性贡献;张耕华师的《〈中国女侦探〉的作者吕侠就是吕思勉》(《博览群书》2009年第1期)则进一步坐实了吕思勉的小说创作者的身份。然而,就笔者所知,系统全面地论述吕氏文学及小说活动的成果,目前在学界尚付之阙如。
- 2 邹国义:《青年吕思勉与〈中国女侦探〉的创作》,《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》,第499页。

究的深度和广度，更可由此管窥近代学者在世风之下的文史互动及转换，从而加深对晚清民国以来的学风及学术之理解。

论及吕思勉的小说创作及研究，最基础性的工作是考订其作品。据目前最权威的本子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之《前言》，收入吕氏小说方面的著述共四部，其中署名悔学子的《未来教育史》刊于1905年的《绣像小说》；署名侠的《女侠客》刊于1905、1906年的《新新小说》；署名阳湖吕侠的《中国女侦探》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；署名成之的《小说丛话》刊于1914年的《中华小说界》。

这四部作品中，《小说丛话》一直被学界公认为吕思勉小说理论的代表作，相关研究成果也最多；《中国女侦探》则在2009年后由邬国义师、张耕华师考订为吕氏之作，阳湖吕侠乃其笔名²；《未来教育史》所署笔名为吕氏早年所用³，且所叙述的江浦背景，与其早年生活相吻合，故而是吕氏之作应无疑问。⁴然而，《女侠客》被认定为吕氏作品，乃由“侠”之笔名推断而出，或许文集整理者以为，阳湖吕侠既已坐实为吕思勉之笔名，则“侠”可定为吕思勉矣。笔者以为此论不妥，理由在于：1. 晚清以来以“侠”为笔者颇多，非专属吕氏所有。2. 《女侠客》一文以青楼女子为歌颂对象，主角之行事风格颇有痞气，而且鼓吹“侠之狭义，即报复是也”⁵，吕氏一生难脱士大夫气，讲求温良敦厚，无论是处世意识还是文风都与之不符。3. 在《女侠客》短短的四回文字中，两次出现了“侠民曰”这样的评论文字，则此处之“侠”即是“侠民”矣。作为晚清小说界一名活跃分子，“侠民”的身份一直有所讨论，现在学界已基本确定为龚子英。⁶很显然，《女侠客》的作者不是吕思勉，而应该是“侠民”龚子英。

这样，四部作品中其实只有三部才是吕氏之作。误识的出现很大程度在于，在当时的小说创研中，用笔名为一时之风，而成名后的吕氏对于早年的文学活

1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
2 可参看邬国义：《青年吕思勉与〈中国女侦探〉的创作》；张耕华：《〈中国女侦探〉的作者吕侠就是吕思勉》。

3 关于悔学子的笔名，可参见李永圻、张耕华编撰：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5、81、104页。

4 以上由张耕华师告知。另，张师透露，他曾有意对此文作详尽考订，因无暇而未竟。

5 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136页。

6 参见郭浩帆：《〈新新小说〉主编者新探》，《出版史料》2004年第2期；杜慧敏：《“侠民”小议》，《现代中文学刊》2010年第4期。

动又不愿提及，这就为我们锁定作者和作品增加了难度。然而，可断言的是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吕氏早年文学尤其是小说方面的著述会不断被发现，而绝不限于以上三部著述。

就笔者的视野所及，在吕氏的作品中，现在至少还可增加署名“侠人”的文字。“侠人”为“小说界革命”初期的文学研究者，其最为著名的成果是1904年左右发表在《新小说》之《小说丛话》栏目中的理论文字，尤其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影响深远。而研治小说史者皆知，《小说丛话》为梁启超所主持，是近代第一个小说理论专栏，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有学者说：“在《小说丛话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侠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。”¹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：

侠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在近一个世纪来实际上伴随着红学研究的过程。只要翻检一下从那以后至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评红论著不难发现，其中不少从方法到某些观点都有着它影响的痕迹，有的专家甚至原封不动地引用其中的话语（却未注明出处）。²

总之，作为晚清民初第一批新小说研究者，侠人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现经过仔细考察，我们认定，侠人其实就是吕思勉，关于此点，将在下节详尽考订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断定的是，在现有的材料和研究基础上，在小说领域，吕思勉的作品除了以上三部之外，至少还有一部署名侠人的著述，依旧维系着四部的原规模。这四部作品的创作时间从1904年至1914年，横跨十年，与晚清民初的“小说界革命”在时间上相始终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，侠人（也即吕思勉）作为近代第一批小说理论研究者，文字发表于梁启超所主持的《新小说》，其时距1902年“小说界革命”仅仅两年，他绝对可算是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最早响应者和实践者，加之吕氏其他作品所透现的梁启超气息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吕氏作品就是“小说界革命”影响下的产物。

然而，从一定意义上来看，吕氏作品既被“小说界革命”所催生，更由时

1 韩进康：《中国小说美学史》，第423页。

2 章继光：《一项不应淡忘的红学研究成果：谈20世纪初侠人对〈红楼梦〉的评论》，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01年第4期，第38页。

代风尚所引致。如果我们将吕氏的个人经历与“小说界革命”重叠至近代的历史环境下，可以发现如下的事实：无论是“小说界革命”还是吕氏个人的文学观念及思想意识，其生发起点应推至甲午战争时代。对于“小说界革命”的起点问题，国外汉学家有过这样的评述：

对中国现代小说诞生更具决定意义的，与其说是在梁氏宣言发表的那一年，更不如说是 1895 年，也就是恰值奇耻大辱的《马关条约》之后，随之出现的第一波创作浪潮可视为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前奏。¹

而对生于 1884 年的吕思勉来说，甲午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时代。正是从那时起，年仅十余岁的吕思勉开始了对于新学的了解，也即所谓讲求经世致用的“经济之学”，此时可以说是其思想意识及知识结构的分水岭时期。一般学界所了解的吕思勉为史学大师，对传统文学亦有较深造诣，然而，他在早年一度孜孜以求的却是这种“经济之学”，吕氏曾回忆说：“甲午战时，予始知读报，其后则甚好《时务报》，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，实为昔日所谓经济之学”，“我的性质是喜欢走这一路的。”²

质言之，这一路的知识学问，其目标乃在于启蒙与救亡，虽然从后世的眼光看来，其中不乏粗率甚至幼稚之处，但在那时，却是士风所向。所谓经世致用也好，“经济之学”也罢，其实质是吸纳新知识、新理念，作出切合时代的知识拯救。而“小说界革命”正与这一路数相契合，作为文学改良的一部分，与梁氏所提出的“诗界革命”、“文界革命”相互鼓荡，承担起了开发“民智”的任务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在时势推引之下，“小说革命”俨然成为了中心地带，根本原因在于，其内在的通俗性满足了启蒙的基本需要，夏晓虹指出：

虽然梁氏并列地提出了“诗界革命”、“文界革命”与“小说界革命”三大主张，但与诗文相比，小说的“浅而易解”、“乐而多趣”，“易入人”、“易感人”，“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”，并且接受面最广，优势明显，这使得小说最有资格充当启蒙与救亡的最佳利器。在此意义上，梁启超才肯定小说为最高等级的文学，或曰：“小说为国民之

1 韩南（Patrick Hanan）著，许侠译：《中国近代小说大兴起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9 页。

2 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742、570 页。

魂。”“小说界革命”于是也成为晚清文学改良的中心。

由此，随着甲午以来国势日蹙，“小说界革命”日渐成为了“文学救国”的核心。故而，“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中，梁启超对‘文学救国’的思想作了最集中、充分的论述。”¹要之，小说已不再是消遣之物，而一跃成为了承载时代使命的文体。在这样的风潮之下，甲午以来报刊风行，而这些报刊又多载小说，晚清小说之兴盛由此开启。

在此风影响下，早年的吕思勉广泛阅读各种报刊，小说革命及新小说的影响日渐进入思想意识的深处。据吕思勉的女儿回忆，吕氏曾“广读新书”，²而这些新书中多为报刊，尤其在青年时代，它们成为吕氏重要的知识来源。在1920年代，吕氏曾作《三十年来之出版界（一八九四——一九二三）》，对于旧报刊可谓了然于胸，他还说：“甲午战时，予始知读报，其后则甚好《时务报》，‘粗知问学，实由梁（启超）先生（《时务报》）牖之。”³尤其是《时务报》可说深刻影响了少年时代的吕思勉，就本论题而言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，吕氏对新小说的了解应从此开始。⁴在晚清时代吕氏所作的《中国女侦探》中，有一个细节描写：“座间各纵谈诸种新小说以为快。”⁵与其是小说人物的生活情景，莫若说是吕氏当时生活的投影。质言之，在“小说界革命”影响下，喜好新小说，并进行创研成为了早年吕思勉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吕侠与侠人：吕思勉笔名问题

吕思勉在进行小说创作时，曾用过与“侠”有关的笔名，由于一直隐而不言，这一情况在近年才被发现。笔者以此为突破口，钩稽出一些新的事实，并

1 夏晓虹：《阅读梁启超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6年，第132—133、164页。

2 吕翼仁：《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》，《历史教学问题》1998年第2期，第44页。

3 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742、201页。

4 吕思勉在《三十年来之出版界（一八九四——一九二三）》（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286页）中说：“译小说最早者，当推《时务报》，所译《华生包探案》及《长生术》等，皆附载报中。自后日报杂志，亦多附有小说。”

5 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147页。

希望由此探寻出其背后的意义,以求得对吕氏文学活动及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深入理解。

前已言及,吕思勉在1907年出版的《中国女侦探》中,署名为阳湖吕侠,此点经考订后已为定讫。阳湖乃吕氏籍贯,在此可略去不谈,吕氏所突出者乃是“吕侠”或“侠”,由此,笔者通过进一步考察,发现晚清时代在《小说丛话》上发表评论的“侠人”其实就是吕思勉。

关于《小说丛话》,前面已经有所讨论,它是梁启超主持下的小说理论专栏,阿英说:“当时有《小说丛话》,亦始自《新小说》,应用当时的理论,以评述旧小说之作,时有新颖理解。”¹而丛话,顾名思义,由各种言论连缀而成,长短、主题不必一律,与有系统、成逻辑的单篇论述有所不同。它在1903—1904年的《新小说》上连载,后集为一帙,于1906年由“新小说社”刊行单行本。《小说丛话》的基本资料,现收载于阿英编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戏曲研究卷》(中华书局,1960年),黄霖、陈同文编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(下册);陈平原、夏晓虹编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亦大部分收载,但侠人文字稍有删节。据梁启超的识语,《小说丛话》为“谈话体之文学”,由不同作者“东鳞西爪”拼合而来,质言之,是多人小说笔谈汇集。²

《小说丛话》的作者分为两类:一是梁启超身边的朋友,即梁氏所提到的“平子、蛭庵、瑤斋、慧庵、均历、曼殊”,他们与梁氏“相与纵论小说,各述其所心得之微言大义”;二是外界投稿者,也即梁氏所称的“海内有同嗜者,东鳞西爪,时以相诘”,他们来历不清,侠人显然属于后者。³也正因为如此,长期以来,侠人到底为谁,学界难有定论,阿英曾说:

侠人不知为谁,为《红楼梦》作一长辩,辩其非淫书,实为一极有价值之社会小说、政治小说、伦理小说、哲学小说、道德小说,并作事实之引申,其结论是:《红楼梦》一书,实系“以大哲学家之眼识,摧陷廓清旧道德”,攻击“旧社会”及黑暗政治之作,以曹雪芹与龚定庵

1 阿英:《晚清小说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年,第3页。

2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: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年,第65页。

3 同上。

并论，称为“近百年来两大思想家”。¹

以上材料虽还未能揭示侠人的真实身份，但有两点却很清楚：一、他不是梁启超身边的朋友，很可能在当时只是初出茅庐的人物；二、崇拜龚自珍。这两点皆符合当时吕思勉的状态。“小说界革命”初起时，吕思勉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在那个时候一度酷爱文学，诗文方面受两人影响最深，一为龚自珍，一为梁启超。据他本人的《日记》：

予是时（二十岁左右）思想极驳杂，为文喜学龚定庵（自珍），又读梁任公先生之文，慕效之。诗文皆喜用新名，史朗人姑丈尝谓予曰：“君之诗文，非龚则东。”²

梁启超和龚自珍对吕氏的影响不仅在文学上，更在思想上。晚清时代，吕氏笃信康梁理论，曾表示：“影响实最深，虽父师不逮也”；³而对于龚氏，则誉之为晚清时代“最大的思想家”。⁴当然，在晚清时代崇拜或者深受龚、梁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，我们不能由此推断侠人就是吕思勉，只可说由此缩小考订范围而已。

而在此基础上，再进一步缩小范围，则可关注以侠为笔名者，这其中最值得辨析的是侠民。侠人与侠民皆为晚清小说的创研者，一字相差，且语义相通，他们会是一人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由前可知，侠民实为龚子英，龚氏为秀才出身，同时又身处买办家庭，所以他通晓外语，并且翻译过《法兰西革命歌琴谱》。⁵然而，《小说丛话》中的侠人却自陈：“余不通西文，未能读西人所著小说，仅据一二译出之本读之。”⁶由此，则侠民绝非侠人矣。而反观吕氏，“于外文，仅能和文汉读”⁷，尤为重要，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7著录有吕侠人编“《惨女界》二卷三十回”，为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商务印书馆本，孙氏提出：“吕侠不知是否吕侠人？”此外，还有论者指出：“作者为常州晚清民国间人。”则吕侠之“侠”与侠人或可相通。在学界，对于吕侠人是否为吕侠或吕思

1 阿英：《小说闲谈四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40页。

2 李永圻：《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31页。

3 吕思勉：《自述》，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745页。

4 吕思勉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》，氏著：《吕思勉遗文集》（下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85页。

5 参见杜慧敏：《“侠民”小议》，《现代中文学刊》2010年第4期。

6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，第75—76页。

7 吕思勉：《自述》，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741—742页。

勉，颇有争议。邬国义师审慎地表示：“尚待进一步研究”；而张耕华师则说：“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所记《惨女界》一书作者的吕侠人似乎不像是吕思勉，目前也没有发现吕先生曾用过吕侠人的笔名。”¹ 笔者未曾查到《惨女界》原书，不敢妄下定论，但吕侠人既是晚清民初常州人，此点又一次吻合吕思勉的身份，加以侠之笔名与吕氏相通，吕侠人是吕侠，也即是吕思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

当然，以上种种还不足以坐实这一猜想。但如果结合十年后吕氏发表的《小说丛话》，再旁及其他证据，侠人就是吕思勉的说法，则应该可以成立了。

吕思勉是一位文史大家，但笔者注意到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他在1914年发表的《小说丛话》与梁氏所主持的理论栏目重名。这一栏目在小说界早已深入人心，如此命名，难道没有其他深意吗？更何况，吕氏之《小说丛话》为长篇论文，中间有着连贯的逻辑系统，根本就不是一种“东鳞西爪”式的言论辑要，这种写法与丛话体例毫不相符，作为学养深厚的吕思勉，不会不知道这一点，这种有意的“误用”可谓颇不寻常。² 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文中还以三分之一多的篇幅来讨论《红楼梦》问题，对于文字洗练的吕思勉来说，这是少有的特例，此外，耐人寻味之处是，吕氏在文中宣称：

以前评《红楼梦》者甚多，予认为无一能解《红楼梦》者，而又自信为深知《红楼梦》之人，故借论小说所撰之人物为代表主义，一诠释之。³

吕思勉为世人所了解的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，文学成就长期以来为人所忽视，而红学方面的论述，大概除了此篇长文，似乎找不到其他成果，在此前提下，能豪迈地说出：学界“无一能解《红楼梦》者，而又自信为深知《红楼梦》之人”，岂不大有曲折？须知，吕氏是一严谨的史家，为人笃实，欺世与自吹不符合其个性。

然而，这些疑窦如果结合侠人问题则能迎刃而解。易言之，只要吕思勉是侠

1 邬国义：《青年吕思勉与〈中国女侦探〉的创作》，《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》，第492页；张耕华、李永圻：《〈中国女侦探〉的作者吕侠就是吕思勉》，《博览群书》2009年第1期。

2 在梁启超之后，吕思勉之前，也有作《小说丛话》者，如恁生、梦生（参见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），但他们也是零散为文，符合丛话之体例，非为有逻辑、一以贯之的长篇大论。

3 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245页。

人，则一切疑点不仅不成问题，而且合情合理。用丛话之体例，看似不合规范，然而吕氏的小说研究正是从梁氏的《小说丛话》开始起步，当他在创作一部颇有总结性的论述，甚至可说是小说研究的收山之作时，用自己初入小说研究之门时的篇名，则不仅颇具纪念意义，实质上更是一种提示性的暗喻。大讲红楼，“自信为深知《红楼梦》之人”亦是如此，当年的侠人对于红楼早已论述在先，得到学界推重，此时吕氏的任何红学“大言”皆不为过，算不得大言不忤。

此外，当我们翻检侠人的言论时，发现它们与吕思勉在晚清以来的活动及语言习惯有许多相应处。下面分别说明之：

一、从个人活动及独特性上来看。侠人在《小说丛话》中对中国小说大加赞美，认为不输于西洋小说，然而，其不足处在于侦探小说方面，他说：“唯侦探一门，为西洋小说家专长。”¹而在几年后吕氏的《中国女侦探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中国小说之美，不让西人，且有过之。独侦探小说一种，殆让西人以独步。”²二者之间在意旨上一脉相承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《中国女侦探》就是侠人理论的实践。又如，侠人认为“文学之性，宜于凌虚”，而“科学小说”以“征实”为特点，他接着阐释道：“如《镜花缘》、《荡寇志》之备载异闻，《西游记》之暗证医理，亦不可为非科学小说。”到了1914年的《小说丛话》中，观点已有所变化，将上述小说归入了“杂文学”与“纯文学”的讨论，而不是所谓的“科学小说”，但在例证中依然延续着当年的知识结构，吕氏这样说道：“如《镜花缘》之广搜旧闻，如《西游记》之暗谭医理，似可谓之杂文学的小说矣。”³所谓《镜花缘》，尤其是《西游记》的评价，实乃一人之语气，十年间观点虽有变化，然措辞及细部知识结构间却透现出内在的高度契合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言及“《西游记》暗证医理”，在当时实为吕氏之创见。此前，言《西游记》为丹道一类之书，与五行相符等等，时或有之，然而，所谓医理之论的得出，颇为少见。而且得此论者必既精文史，又通医学。在当时的文史界中，此种人极少，吕思勉即预此选。少为人知的是，晚清民初以来，吕思勉与国医名家谢利恒等过从

1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，第76页。

2 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147页。

3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1卷，第77页；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222页。

甚密，经常询以医事，他虽谦虚地表示：“读古医书，时或下问。”¹但他却协助编纂过《中国医学词典》，并撰写过《医籍知津》一书，胡道静为此评价道：“先生读过的古典医籍之多，钻研之深，是罕有伦比的。”²既然通医且精文史者，除了吕氏而外难有二选，则不正说明侠人与吕思勉为一人吗？

二、侠人的很多观点在 1914 年的《小说丛话》中得以继承和引申。如侠人说：

今观《红楼梦》开宗明义第一折曲，曰：“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都只为风月情浓。”其后又曰：“擅风情，秉月貌，便是败家的根本。”曰“情种”，曰“败家的根本”，凡道德学一切锁禁事之代表也。曰“风月情浓”，曰“擅风情，秉月貌”，人性之代表也。³

以情性、人性来解读《红楼》，此点在吕氏的《小说丛话》中得到继承，而且对第一折曲进行解说之后，不仅阐释道：“曰‘风月情浓’之‘情’字，人心之代表也。”而且对“人之性”与小说之关系深为致意。⁴比较两篇文章的思想及文字，颇疑为一人手笔。又如，侠人说：“不知资著者大智大慧，大悲大慈之眼观之，直无一人而不可怜，无一事而不可叹，悲天悯人而已，何褒贬之有焉。”这种“同情”的态度在吕氏《小说丛话》中也很强烈，且风格极为一致，而且吕氏强调说：“无悲天悯人之衷，决不能做《红楼梦》。”⁵论点、语调如出一辙。

三、侠人文中的一些习惯用语与吕思勉的行文习惯相合。如侠人说：“孔子曰：‘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吾谓此言实为小说道破其特别优胜之处也。”而在吕氏的《小说丛话》中，则这么说：“孔子曰：‘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斯言也，可为小说作一佳赞。”⁶二者的说话语气、用词习惯基本一致。又如，侠人说：

呜呼！戴绿眼镜者，所见物一切皆绿，戴黄眼镜者，所见物一切皆

1 吕思勉：《谢利恒先生传》，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 27 页。

2 胡道静：《吕诚之先生〈医籍知津〉稿本题记》，载于吕思勉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69 页。

3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 1 卷，第 75 页。

4 吕思勉：《小说丛话》，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 230—231、222 页。

5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 1 卷，第 74 页；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 251 页。

6 陈平原、夏晓虹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 1 卷，第 77 页；《吕思勉诗文丛稿》，第 247 页。